

The logo consists of a large, bold, black letter 'Q' positioned above a large, bold, black letter 'A'. A small ampersand '&' is placed between the two letters, slightly to the right of the center.

發言一：

曾熾芬教授指出，在全球化的競爭壓力下，「教育」是許多問題的最終解決之道，公共資源應該介入提供因應全球化新經濟活動的知能，繼續增加對國民教育與技術訓練的投資，進而適當發展在地人的「全球性」能力，我非常同意；尤其是成年、終身學習的教育，台灣現在做的還不夠。

另一方面，許多人對全球化抱持很天真的想法，以為全球化必然導致均勻化，但其實區域化的形成，已經清楚顯示全球化絕對不會自然的均勻化。如果根據聯合國統計，從一九九五年WTO正式成立以來，不論國與國之間，或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都在拉大，而以「公與義」的角度來看，全球化似乎引來一個很嚴重的威脅。我們該怎麼看待當全球化發展以後，它對公與義所造成的困境？

發言二：

台灣的老人人口已經超過九%，屬於老人國家；過去老人福利的預算分配是二十二億元，現在已提高十倍為二二〇億元，而政府是採用津貼的方式補助老人生活。不過，目前全球有一三六個國家已經採行國民年金制度，唯獨貿易債權國佔十四、十五位的台灣，卻始終沒有國民年金，相關制度也沒有建立。如果是以前國民黨的提案版本，無論貧富都繳同樣多的準備金，像繳人頭稅一樣的話，怎麼能算是一個互助的社會？所以我認為，國民年金先做基礎年金即可，基礎年金也就是一個課稅指南。

這幾年在全球化下，台灣為吸引跨國企業投資而頻頻釋出降稅手段，但降稅之後，政府會遇到兩頭燒的困難，這個問題其實攸關著我們人民的生活層面。一如胡勝正委員、林孝信老師所言，全球化的競爭價值絕對不是均質化，而是輸者將輸得更慘，我們面對這個弔詭，尤其要加強社會福利。胡委員認為社會福利是要「給魚竿」，但我認為同時也應注意，或許有些人根本沒有能力拿起魚竿，因此必須由社會安全團體去照顧他。延伸而言，

全球化不能只強調經濟層面的全球化，還要強調人文層面的全球化，並建構全球的社會安全網。倘若「分享」的觀點無法在社會中擴張或呈現，則未來社會上、國際上，勢必容易發生以大吃小、強權壓迫的現象。

發言二：

針對失業問題，我簡短的發表一點看法。過去我做過一些研究，發現從產業結構來看，影響就業水準消長的因素，主要包括「產能的調整」與「新興產業的興起」。基本上，產能結構的調整對就業是不利的，譬如產業外移會影響整個生產線的佈置，這個部分不太容易處理。但在政策的思考上，如何引導新興產業的投資，創造更多就業機會，這個部分應該是解決失業問題比較好的方向。

現在扁政府認為產業外移等於就業減少，因此不希望產業外移。然而，產能的調整其實是必然的現象，所以我們應該把焦點放在「如何引導更多的產業興起」，繼而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其次我想呼應蔡勳雄執行長的看法，也就是應該把台商赴大陸投資，看成是台

灣力量的擴張，而不是分散。我記得兩年前，台灣對於是否開放八吋晶圓廠赴陸投資的爭論甚大，其中有一個觀點認為，八吋晶圓廠外移後，相關上下游產業也將隨之出走，連帶的本地產業會整個被壞掉，而在大陸的新產業將反過頭來對台灣構成競爭威脅；可是我們的研究結果卻發現，台灣產業到大陸投資之後，本身產業群聚並未瓦解，在大陸的新產業群聚也是以台商為主。以電子業為例，目前只有五%的零組件是向大陸廠商採買，九十五%仍然是台商的產品，換句話說，新的產業情勢仍然控制在台商的產業手中，如果從全球市場競爭來看，進入大陸投資，甚至可說是讓台灣的全球競爭力增加了一倍。所以有些誤解的觀念，應該澄清。

曾熾芬 回應：

據我了解，反全球化的「反」並不是一概反對全球化，而是反對由企業及金融為主軸所發展的全球化，也就是說，我們期待的是一個社會民眾可以參與的全球化，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有關失業的解決，許多工業先進國家目前都在談論「工作重新分配」，但所



謂的重新分配不是減掉薪水，而是縮短工時，這對我們而言是很新的概念，可以再進一步思考。

胡勝正 回應：

簡錫堦執行長剛才提到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作為全球化贏者圈的圈內人，我完全同意。我們確實應該了解到，無論全球化與否，每個經濟體裡面一定有些底層的人，沒有辦法靠教育、職訓，化解生活的問題，國家本來就應該照顧他們。但是換個角度，面對因為全球化進程、產業外移而失業的人，我們若只抱持「給他失業救濟金」的心態，卻沒有再給他職業訓練，那麼他們仍然沒有機會進入贏者圈。所以我們應該儘可能提供長效的幫助，將人拉到贏者圈內，這是我的重點。

蔡勳雄 回應：

有關台灣結構性失業的調整，政府佔了很大的角色，我同意胡勝正委員提出加強職業訓練的主張，但台灣本身也要積極創造新的產業。舉一個比較簡單例子：也許當台灣與大

陸關係轉好之後，可以更大幅度開放大陸人士來台灣觀光，促進本地觀光業再發展，讓閒置的人力、多元的產業都能活化起來，這是調整結構性失業的方向之一。至於長遠來看，對教育制度、國家競爭力的投資，當然還是最主要的關鍵。此外，我要再次提醒，台灣目前前在國際上處於非常尷尬的情況，倘若今後在區域化的過程中，我們沒有辦法透過FTA或WTO的架構下，和他國順利進行貿易，後續造成的問題恐怕非常棘手，大家應該及早且嚴肅的考量。

王振寰 回應：

台灣確實在轉型，而這個轉型是在整個全球化的脈絡當中；值此之際，台灣必須面對和先進國家的競爭，所以人力、創新非常重要，政府應該做得更好。在這個轉變的過程，台灣不太可能像過去一樣，新的社會裡將有一些能夠面對全球化的人，也有一些無法面對全球化的人，其中具有高生產力者，必須負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也就是走向福利國家。對此，政府必須認真規劃，不是每次在選舉期間喊一喊就算了。其次我認為，面對全球化，



台灣必須要有更正面的態度。反全球化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因為勢不可逆。事實上，具有反全球化意識的人，本身大概都能說英語、到世界各地旅行，也有足夠能力因應全球化的衝擊，簡言之，「最全球化的人才能夠反全球化」，所以人必須進入全球化，才能進入新的世界，這是我的想法。

劉兆漢 結論：

各位的談話有幾點共識：第一，在全球化的環境之下，許多問題都要透過教育解決，其中特別要關注在職訓練、第二專長訓練等。第二，台灣未來是否能有競爭力，和我們有沒有具前瞻性、創新能力的人才息息相關，而這個層面則牽涉到高等教育的改革。台灣現有一五〇餘所大學，想要通通變成國際一流學府，在資源上、條件上絕對不可能，所以我們一定要釐清各大學的任務，資源的分配才會有效，也才能真正建立擁有最高學術水準的大學。第三，關於社會福利部分，在全球化「贏者愈贏」的情形下，必定要建構社會安全網，讓未能進入贏者圈的人，也能夠生存下去。第四，為因應全球化，很多產業必須進行

轉型，在創造新產業與新就業機會方面，與會者特別提到服務業的興起，而服務業的發展，有許多問題都和兩岸關係相連，這個主題留待下一場討論，謝謝大家。

心與戰